



赵歌东 © 著

QI MENG YU GE MING

启蒙与革命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LUXUN YU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歌东 © 著

QI MENG YU GE MING

启蒙与革命

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LUXUN YU 20SHIJI ZHONGGUO WENXUE
DE XIANDAIX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与革命: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赵歌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004-9956-5

I. ①启… II. ①赵… III. ①鲁迅著作 - 文学研究 IV. ①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4274 号

策划编辑 杨晓芳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启蒙与革命——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08JDC116）资助；
海南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经费
（编号：HS—1—2011—050106）资助

序

一

在这个世纪之交，鲁迅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主流作家早就发出“鲁迅能引发地震”的警告；以边缘自居的新生代作家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适时的学者们研究的是鲁迅的矛盾和困境；而网络上热炒的话题则是鲁迅是不是“最大的汉奸”……与此同时，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迅速减少，尤其是那些锋芒锐利的，已被全部删除。这一切，来自方方面面，很像是约好了的联合行动。

正因为如此，鲁迅早已悄悄被请下神坛，不再享受昔日的香火。与此相伴随的，必然是研究他的人正在逐渐减少。关于这一点，从报刊文章目录中可以看到，从博士、硕士论文的选题中也可以看到。今日中国有庞大的博士、硕士队伍，但在成千上万的学位论文中，研究鲁迅的已经并不多见。这也是这个时代正在告别鲁迅的一种证明。由于特别的历史原因，我对鲁迅有点亲近感，所以是不愿告别鲁迅的，不赞同以破坏传统罪驱逐鲁迅，也不赞同在鲁迅与胡适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我的这种态度表现于发表的文字之中，也表现于平时的课堂上，一般说来，对学生不能没有丝毫影响。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影响学生的趣味和选择，因为主流文化及其造就的时代趣味毕竟比个人力量大。在我过去20年指导的八十多名硕士中，毕业论文选鲁迅研究的只有一个；30名博士当中，论文做鲁迅研究的，也寥寥无几。当然，也许是因为在我身边，他们并没有表现出人们常见的那种对鲁迅的厌恶或恐惧，而是因为

鲁迅研究已经是一片被反复挖掘的矿区，是否还能挖出东西，实在不知道。而且，光是打扫旧作业区的垃圾，就不知要忙活多少年。所以，他们大多对鲁迅敬而远之。

然而，赵歌东却走向了鲁迅，而且选择鲁迅研究做自己的学位论文。

选择鲁迅研究，事实上也有一些讨好的课题，无须投入而能获大利，这是只要不特别愚笨就能想到的。而赵歌东的课题却显然不会讨好：启蒙与革命，这两个关键词在当下中国都不招人待见。启蒙之时运不佳已经很久了：20世纪30年代不走运，是因为它有碍做“总理（指孙中山先生）纪念周”的效果，不利于党国的步调一致。抗战时期之所以不走运，是因为担心它会有碍于救亡。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革”时期，因为它被划入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是落后或反动的意识形态，推崇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当然要与之划清界限。所以，鲁迅的启蒙思想就成了他“早期的思想局限”，各类教科书在把鲁迅捧上神坛的同时，都没有忘记指出他的这一“弱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回归五四”和“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思潮涌动，启蒙似乎要时来运转，甚至出现过名为“新启蒙”的刊物。但众所周知，“新启蒙”这一概念源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所以，它与启蒙距离甚远。正因为这样，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人喊过一些启蒙口号，而真正能把握启蒙真谛的，举国上下并没有多少人，而且转瞬即逝了。但即使如此，罪过也在不赦之列，所以后来要借用后现代和法兰克福学派之类种种新的装备，消除它所导致的后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一时间，批判启蒙理性与反思现代性一起成为适时的潮流。于是，人们以或新或旧的武器装备起来，一齐向启蒙、现代性、知识分子等有碍中国传统的东西发起猛攻。彻底扫荡当然并不容易，而这些词语却已经被涂抹得面目全非。

至于革命，更无须多说，时代变了，现实的中心任务也变了，它自然在“告别”之列。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歌东的选择是知难而进，而且似乎没准备躲避风雨。鲁迅研究本来就很难做成象牙塔里的学问，而这样的选题更无法回避当下的时代，无法回避当下社会各种思想矛盾和冲突。歌东为人厚道，为文也温柔敦厚。他不愿挑起事端，但做学人的责任感使他并不回

避思想和学术上的问题。

二

赵歌东对鲁迅研究的关注是很早的，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他只是看，并不多发表议论，也未发表文章。十多年前，他开始写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因为他觉得鲁迅研究界已经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

记得他写过《“走近鲁迅”的尴尬》、《被误读的先驱性》等几篇论文，发表在《文艺争鸣》等报刊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历史中间物”这一论题的看法。是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进化的阶梯上，任何新事物最终都是“中间物”。但是，除了作为自己嘴里的谦词，这话还需要说吗？既然说，自然有言说的功用。“中间物”论题的提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功用，那就是使先驱失掉意义，使鲁迅的精神遗产不再先进，因而不需要珍惜。其实，这正是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成仿吾、钱杏邨等人想说的话。他们指出阿Q时代已经死去，强调鲁迅已经过时，并没有否定鲁迅曾有的历史意义，只是不承认他还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把鲁迅放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他对中国社会的描绘也罢，对阿Q灵魂的揭示也罢，都是有意义的，但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了，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于是，鲁迅不过是“历史中间物”而已。那一年，鲁迅47岁，在此之前，他是先驱；在此之后，他就成了“历史中间物”。20世纪50年代的教科书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没有使用这个概念，而是强调鲁迅早期思想的“历史局限”。所以，对“中间物”的强调，很容易让人感到它是20世纪80年代对鲁迅启蒙思想重新肯定而引起的反应，在以新的说法远距离声援钱杏邨、周扬等人关于鲁迅历史地位的认定。

从鲁迅活着的当年，到鲁迅逝世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总是有人觉得自己早已超越了鲁迅，而且以更年轻、更进步的自豪姿态俯视鲁迅。这种做法得到了“中间物”论的支持。可惜的是，这种支持是无力的。因为众所周知，虽然一切新事物的最终命运都是“历史中间物”，但在某个历史时段之内，甚至是相当长的时段里，一些东西未必能成为“中间

物”。在时间的进程中，“新”的东西会不断出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新生的未必是进化的。其中原因不难明白：按照进化的规律，时间坐标上新出现的东西应该比原有的东西更新，也更进化，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因为进化的链子并非单线条，新生的那一环说不定接在哪条链子的哪一环上。“历史中间物”论者只注意时间链，而常常忽视非单线条状态下的传承谱系，因而常把“新”的、“后”的认作更先进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歌东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随着先驱者形象在以‘中间物’为取向的民间化语境中隐身，先驱者‘救救孩子’的启蒙之声转换为‘一切皆流’的私人言说，先驱者走出‘铁屋子’的世纪呐喊成为从抽屉里发出的‘一切都是历史中间物’的自言自语，先驱者‘为人生’的精神原创成为个体人生的生命初体验，先驱者‘改良国民性’的启蒙意识成为‘反抗绝望’的自我否弃，先驱者‘立人’思想的宏大叙事结构成为‘“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一个人的战争’。21世纪的鲁迅研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历史起点：在一个无处呐喊也无所呐喊的时代，先驱者的呐喊已成为遥远的回声，先驱者上下求索的前驱姿态已成为历史‘过客’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先驱者的先驱性只留下‘逝去逝去’的一声叹息。”为此，他严肃地剖析了鲁迅研究界“中间物现象”的误区，写下了这样的内容：“一方面在哲学上以无命运的‘中间物’意识粉碎先驱者的命运和先驱者的先驱性；另一方面在逻辑上确认无命运的‘中间物’意识本身就是先驱者的命运和先驱者的先驱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先驱者以其自身的先驱性粉碎自身的先驱者命运，并通过自我粉碎解构一切先驱者的姿态和先驱者的先驱性。这里，‘中间物现象’的理论误区在于对先驱者的先驱性的历史性误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误读是深刻的，因而也是致命的。”

在这样一系列思考的基础上，赵歌东的研究获得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三

关于赵歌东的研究，我还想指出这样几点：

首先是他丰厚的学识避免了像一般年轻学者那样摇摆，也避免了被

时髦的潮流裹挟而去。

末流学者之所以不能成为优秀学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时代流行的理论和术语所驾驭。时代流行什么书，就去读什么书；时代流行什么理论，就去套用什么理论；流行词汇不等弄明白，就赶忙拿来运用；这是我们常见的。有时候，始作俑者不过是因为汉语基础太差，外文又没消化好，所以无力把话说明白，不得不绕来绕去兜圈子，用了许多理论术语，最终表达的不过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道理，有时还因为绕圈子太多而加错了数字。然而，在一个贫乏的国度，这也会成为时髦。因为那不太明白的术语和半通不通的句子堆砌，也常常显得更玄奥。

这种盲目追风的行列中没有赵歌东。他从不追风，而是扎扎实实地读他的书，思考他的问题。他常有一些不同流俗的见解，原因主要就在于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当前学界的时髦，而是扎根于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积累的那些经过反复淘汰和检验的经典。在我见到的年轻学者中，没有哪一个比赵歌东读过更多的“汉译名著”，我说的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个书系。无论是黄皮的、绿皮的还是橘红皮的，在他的书架上都有长长的一排。一个人一旦占有了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主要思想资源，熟知从洛克到思想启蒙运动领袖们，再到杜威、罗素、哈耶克、亨廷顿等组成的思想家阵列，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基点，当然与视野中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或者只有萨伊德、杰姆逊等人大不相同。无论在本书中体现得如何，赵歌东凭借他思想资源方面的优势，都必然要高于国内那些追赶时髦而看不懂人类思想流变地形图的著名学者们。

因为对于人类文明走过的道路的了解，赵歌东避免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都无法避免的思想混乱和迷惑。在种种力量作用之下学界纷纷声称现代性难以把握，歌东却清楚地知道，现代性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操作的文化符号：“现代性的历史以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为背景，体现了人类文明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历史的现代性表现为西方现代性追求和现代化扩张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为物质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三个不同的历史层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致力，正是它的第三个层面——思想文化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以‘立人’为

核心，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体系”。正因为这样，他的现代性追求集中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选择，确立了新文学的个人本位。

其次，对中国 20 世纪历史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使得他面对五四、面对鲁迅、面对当下的鲁迅研究，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历史进程常常出现断裂，断裂处则常被油漆或积尘覆盖。人们在遮蔽或改写过的历史叙事中长大，在认识事物时，往往缺少一个必要的历史知识结构。所以，事物的面目常常模糊不清，重写，再研究，也往往仍然不清。即使是一些善于思考的青年，也常常因为借用的历史知识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赵歌东的优势也是明显的。他不是那种急功近利写文章的人，长期读书，却并不急于写作和发表，甚至有足够的时间去写诗歌和小说。他用一个指头敲键盘打字，显然无意追求速度；只是悠闲地读书，悠闲地写笔记，似乎只想做个明白人，而不急于做名人。仔细想来，燃一支烟，于边缘处静静地看着文坛和学界浅薄无知的表演，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他就这么看着，不多说话。但长期的积累，使他对历史有高于常人的洞察。所以，当他面对现代性这类课题的时候，就不会像一些人那样说些糊涂话或混账话，而是能够表达一些清醒的见解。他看到：“鲁迅去世以后，中国文坛因为放逐现代性或反抗现代性而在某种意义上走向传统性和民族性。”因为他知道，“历史地看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而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跳跃性过程，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追求也不是单向推进的，而是存在着追求现代性和反抗现代性的双重性。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追求既不统一也不平衡，中国现代文学新传统的建设屡被搁浅，甚至几度出现倒退现象”。在这一大背景上，他努力寻找值得珍惜的资源，重要的发现就是鲁迅。鲁迅虽然也会出现脚步错乱，但他的现代性追求毕竟是一个连续的、统一的思想事件，可能被涂抹，却最终无法改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能充分认识本书的意义。

四

当然，就这本书而言，我以为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关于鲁迅与“左联”的章节做得好，好就好在细节上下了工夫。相比较而言，本书关于启蒙，关于革命，关于现代性，却没有具体深入地进行细节性的梳理和考察。其实，一些细节性的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如鲁迅与革命的关系，从早年加入光复会但没有接受回国从事暗杀活动的任务，到晚年加入“左联”而拒不参加飞行集会；如鲁迅的革命观，从一贯地支持革命，到“革革命命”的言说；再比如鲁迅的启蒙思想、启蒙之路、启蒙形式（文学的），都做些更为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同时以细节性的材料生动地呈现出来，本书就会厚实许多，读者也会觉得更有趣味。

本想只写一两页，结果却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就此打住。

李新宇

2010年4月 于天津南开馨名园

目 录

序.....	李新宇(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现代性:辞源与词性	(1)
第二节 现代性的历史:“主义”与“问题”	(7)
第三节 历史的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	(17)
第二章 鲁迅创作的现代性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	(26)
第一节 以鲁迅创作为表征的现代性	(26)
第二节 鲁迅创作现代性研究综述	(37)
第三节 未完成的五四与现代性的冲突	(47)
第三章 鲁迅与晚清时期的现代性思潮	(58)
第一节 晚清时期的思想启蒙	(58)
第二节 晚清的“排满”与革命	(67)
第三节 鲁迅与晚清启蒙与革命	(72)
第四章 鲁迅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81)
第一节 鲁迅对近代中国革命的独立思考	(81)
第二节 走向《新青年》:鲁迅的启蒙之路.....	(91)
第三节 改革国民性:未完成的启蒙	(102)

第五章 鲁迅的革命体验及其两难选择	(114)
第一节 鲁迅与“后五四时期”的文艺论争.....	(114)
第二节 鲁迅与左联关系始末.....	(126)
第六章 鲁迅与左联五烈士事件	(136)
第一节 左联五烈士事件的背景与经过.....	(136)
第二节 鲁迅对左联五烈士的纪念及其意义.....	(151)
第七章 鲁迅与“两个口号”论争	(158)
第一节 “两个口号”论争的背景与起因.....	(158)
第二节 “两个口号”论争对晚年鲁迅的影响.....	(165)
第八章 作为革命“同路人”的鲁迅	(172)
第一节 “同路人”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	(172)
第二节 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及其自我定位.....	(176)
第三节 左翼对“同路人”的态度与鲁迅“横站”的姿态.....	(181)
第九章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转型	(187)
第一节 瞿秋白对“同路人”的发现及其对鲁迅的定位.....	(187)
第二节 冯雪峰对鲁迅革命形象的塑造.....	(191)
第三节 毛泽东的“圣人说”及其对鲁迅的评价.....	(195)
第十章 结语：被误读的先驱性	(201)
附录 关于《鲁迅全集》几条注释的考订	(205)
参考文献	(21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现代性:辞源与词性

现代性问题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从理论上看来,一个时期内学术界关于现代性概念的运用和诠释存在泛化倾向,一些研究者对现代性概念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范畴缺乏必要的历史分析和理论界定,现代性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下存在很大的歧义。值得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论者在没有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种种歧义作出历史分析的前提下,简单地从传统性、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角度质疑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合法性,从而也在某种意义上质疑和否定包括鲁迅创作在内的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面对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质疑和否定现代性的文艺思潮及其对鲁迅创作和五四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挑战,有必要对现代性概念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

现代性(modernity)谱系是一个以现代(modern)为词根的话语系统。在这个话语系统中,由现代(modern)一词所衍生或引申而来的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e)、现代主义(modernism)、前现代(premodern)、后现代(postmodern)等概念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知识谱系的主体结构。在欧洲历史文献中,现代(modern)一词的拉丁文是“modernus”,

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经院神学，以“现代”为核心的概念系统成为划分和界定人类社会变革进程的基本话语范式：

“现代化”作为一个描述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事物发生迅速变革的过程的一般概念，出现较晚，但是“现代”作为一个指称当前时代性质的术语可以追溯到6世纪晚期拉丁语的用法，这个术语首先在拉丁文中，尔后在英文和其他语言中被用于区别当代和“古代”的作家与作品，到了17世纪，“现代性”、“现代派”和“现代化”被运用于各种多少有限制的、专门化的语境。“现代”，在早些时候，往往被赋予一种陈腐平庸的贬义，莎士比亚一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当英国作家把法国革命的领导人称作“现代派”时，他们无疑也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然而，还是有人在更为客观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到了17、18世纪，欧洲的历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已为普遍接受的以基督纪元为基础的历史分期，开始采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人们当初认为现代历史随着君士坦丁堡的衰落或美洲的发现而突然开始，……但是，现在更流行的说法是：现代史开始于“1500年前后”。^①

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这一术语的英文单词早在1627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中就已经收录，法语中的现代性(modernité)一词则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②。在英语和法语中，“现代性”一词最初都首先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英语中的现代性一词最初是针对诗歌节奏而言的，其适应范围有限，使用并不广泛；法语中的现代性一词成为一个流行概念，是从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定义开始的。波德莱尔以绘画为参照对现代性的定义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每个古代画家都有一种现代性，古代留下来的大部分美丽的肖像都穿着当时的衣服。他们是完全协调的，因为

①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②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9页。

服装、发型、举止、目光和微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仪态、眼神和微笑）构成了全部生命力的整体。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要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一句话，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①这里，波德莱尔从审美意义上指出了艺术作品的美包含着现代性与古典性，现代性处于变化之中，而古典性则作为某种时代的标志而进入永恒状态。在社会意义上看来，现代性的流变建立在古典性的基础之上，或者说时代的选择与时尚建立在历史、文化中被古典化了的普世性原则之上。离开了古典化的普世性原则，艺术的美将是抽象的、虚无的。同样，离开了现代化的普世性原则的历史程序，现代性也会走向抽象与虚无。

在一般意义上看来：“‘现代’之语义，无论在西语还是汉语思想中，总是与‘古代’之义相对比。‘古代’与‘现代’构成了一种生存性的张力，这种张力首先不是一种年代学的时间对比，而是生存样式和品质的对比造成的。‘现代’所蕴涵的是生存性的时间，带有在体性（ontic）的意涵，表明生存品质和样式的变化，与过去的生存品质和样式构成紧张关系。从生存性的时间意义上说，每一世代都可能发生‘现代现象’，‘现代’因此是不断发生的生存性事件：现代与古代的对比，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的结构与演化之间的自然张力。”^②“现代”一方面与“古代”之间构成一种张力，同时又在与“古代”的对比中不断被古典化。现代性的表象往往包含着各种互相对立的因素和可能，但其内在的古典性和普世性不会任意地改变，因此，现代性既不会被终结，也不会被取代，其自身内在的连续性的裂变构成现代化的动力：“我们决不能把现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性的一场简单转变，而应将其看成从远古时代到不尽未来的无限连续体的一部分。……一旦人们将现代化看做一个过程，就会想到它是一个伴随知识增长及其对人的各种行为方式的影

① [法] 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见《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425页。

②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3页。

响而连续变化的系列。作为一种将某种程度的秩序赋予极为复杂的人类事物的方式，我们可以将传统社会设想为在现代知识施以最初的影响之前的一种相对静止的承继而来的体制或结构。现代知识的影响将改变传统体制必须执行的功能，反过来这也影响体制本身。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功能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就是现代化进程的核心。”^①

现代性的源起与欧洲 15—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 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分不开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个时期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的现代性表现在他们的天才的智慧和优越的个性，他们把神圣的神学变成了常识性的科学，把神秘的宗教变成了世俗化的信仰，他们尝试在各个方面重新发现自然法则，鼓励人人重新发现自己和认识自己：“在其本质上，文艺复兴是反对那个神性有余而人性不足的时代的，它反对中世纪神学压制和阻碍人的某一方面，也反对某种超自然的幻影——这种幻影将某种致命的强制性强加给那本来更为纯粹的人性的和自然的能力。……文艺复兴第一个时期占据主流的是一种解放运动——对感官的解放，对才智的解放，在北方国家里还是对良知的解放。这是第一个伟大的扩张时期，是对个人主义的第一次促进。”^②

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把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知识分子的天才的智慧和优越的个性从哲学意义上提升到了理性的高度，从而使这个时代的现代性获得了理性的品质和特性。在启蒙运动中，科学、艺术和时尚是建立在以爱智和沉思为表征的理性基础之上的，“我思故我在”、“知识就是力量”是这个时代的口号和标志。与文艺复兴时期以天才与个性为表征的现代性相比，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对哲学和理性的敬仰和崇慕：“启蒙时代的特征是，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想成为哲人。人们认为，哲学探索世俗处世道理中本质上属于常识的东西，并且，只依凭它自己而不仰赖权威。此外，人们对抽象哲学本身并不特别感兴趣；他们主要把哲学用作进行宗教和政治改

①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76 页。

② [美] 欧文·白璧德：《什么是人文主义？》，王霖译，见美国《人文》杂志社编：《人文主义：全盘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9 页。